

東方-西方，西方-東方

宗薩欽哲仁波切開示

一位紐約的朋友最近電郵給我一篇題為 “藏傳佛教在西方是否可行” 的文章。

儘管我對這篇文章的第一反應多少有些自我辯護，但我還是不得不承認，這位作者

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觀點。對這場看

似沒有盡頭的爭論，如果我再加上另

一個觀點，貌似有點徒勞；但早在現

代文明慶祝言論自由的勝利以前，佛

陀就十分看重對理性思考的尊重，強



調我們必須檢驗修行的道路，而非盲目追隨。然而，顯而易見的是，即使在這個所

謂的 “現代” 社會，盲從的信仰不僅存活著，而且還頗具活力，甚至達到了這

樣的地步：僅僅因為某位教士宣稱為他們去天堂打包票，人們就願意為之放棄生

命。甚為重要的是，我們不僅要實踐言論上的自由，以檢驗修行之道及其權威性，

而且我們還必須提防與之俱來的文化包袱。對這個文化，我們需要接受多大一部

分？作為西方人，是不是就缺乏作佛教徒的要素？或者，這些“上師”們是不是非得將法教折衷以迎合西方人？

多年以來，西藏的上師們在西方贏得了不少歡心，這主要該歸功在他們身上體現出來的佛陀精巧的智慧，也歸功於他們中許多人看起來溫文爾雅，而且喜樂。另外，西藏上師已成為瀕危物種這個事實，也有助於他們在西方大受歡迎。更何況還真有些少數真才實學的上師可以用來作櫥窗展覽呢！然而，最初的迷戀已經到頭了，而且，一些西方人已經開始意識到佛教與西藏文化之間的巨大差異。

在現代傳媒的輔助下，當社會態度發生變化時，對公眾人物的聚焦以及對所謂的靈性道路的懷疑也開始增加了。前所未有的，普通的藏人，特別是上師們，開始被迫嘗到了自由社會的甘苦。他們中有些人痛苦的認識到了這一點：受歡迎和獲得成功，需要付出代價。另外，雖然心不甘情不願，但藏人開始接受這個事實：把他們認為是更高等的生活方式強加給西方人，這種嘗試是行不通的。然而，就像許多其它東方人一樣，藏人仍然緊緊抓著他們所有的文化傳統，甚至包括那些從藏人的利益角度來考慮都應該被摒棄的文化傳統，作為對一切的最終答案。就這樣似乎還不

夠，更有甚者，許多西藏上師堅持要求，他們的弟子們在接受佛教的同時，也要全盤接受西藏文化的全套包裝。這個佛教與西藏文化的大雜燴，實在讓許多人難以消化。

在今天，由於缺乏足夠的詮釋，即使是像皈依這樣的基礎佛法教授都被當成有神論了。當我們念誦像“我皈依佛”這樣的祈請文時，我們極少提及，從而忽略了祈請文的本質含義，比如了解我們的根本本質即是佛。在這樣的情形下，難怪那篇文章的作者會用“捕捉者”而非“解脫者”來形容上師及僧眾。由於上師們承擔著將佛法傳播到西方的任務，因此比起那些對佛法感興趣但並不熟悉佛法的西方學生們，上師們對法教負有更重大的責任。但是，西藏上師們非但沒有將法教變得更容易獲得和理解，而是反其道而行之；由於他們的極具優越感的偏見，由於從根本上缺乏對西方人的“尊重”，由於對西方人的思考方式興趣缺乏，這些全都導致了西藏上師創造出了與西方學生的巨大隔閡。

有一個關於病人，醫生以及治療的傳統佛教比喻：不同的病人各有其迥異的問題，因此醫生需要對症下藥來診治。但如果西藏上師將西方學生的文化和習慣嘲諷為

“徹頭徹尾的浪費時間”的話，治療要如何生效呢？他們是否真建議西方人應該跟不識字的西藏牧民一樣，獲得同樣的教授？這種對西方人的缺乏尊重不是最近才有的，藏人們由來已久的認為，西方人是蒙昧野蠻的。甚至在 1959 年以前，隻因為他們的外國人身份，許多游客被拒入境西藏。有人認為，藏人失去了他們的家鄉，最應歸咎的是他們自己：他們的極端排外，以及認為一切外來的事物都是“不聖潔的”，從而蔑視和拒絕所有外來事物的這種態度。但即便如此，很多西方人仍為藏人的熱情，彬彬有禮和友善所傾倒。雖然藏人的這些表現更多是出於社會義務而非出於真誠，但西方人對此一無所知。在大部分藏人的笑臉背后，仍然有“你是個西方人”的潛在心理。而那些少數的真誠笑臉，很可能是緣於希望你能資助他們，或者最近的趨勢是，希望你能幫助他們獲得綠卡。

那位作者還提出了另一個讓人無法忽略的評論：這些“上師”們的牢騷總是老調重彈，讓人大打哈欠。藏人不單認為西方人對佛法的追求是“膚淺及善變的”，而且認為這種追求隻是投石問路而已；他們忘記了這種研究的態度正是佛陀所鼓勵的。你越分析研究佛法，就越發現它的偉大之處。

此外，對普通的藏人，特別是一部分上師來說，對物質的追求已經成為了首要目標。在這種情況下，把西方人貼上“物質主義”的標籤實在是有點荒誕。各大西藏難民營什麼都彼此攀比：從最大的寺院到最新款最名牌的轎車。要是某些高階上師願意把他們的金銀茶杯墊賣掉，就能為成百上千的埃塞俄比亞飢民提供好些日子口糧。

藏人們認為西方人“選購佛法”，認為西方人不能保持密續教法的隱秘性，這些都是事實；但問題是，如果“上師們自己把佛法搞成一場巡回演出”，包括展出像沙壇城及金剛舞這樣的表演，難道真的隻有西方人該受到責難嗎？

如果我們盡早的能夠發現藏人的所有軟肋，會更有幫助。否則也許我們可能會因為幻想破滅而放棄整個佛法。但發現這些軟肋並不是一項容易的任務。由於一代又一代的虛偽矯飾的經驗，這些上師們已變得相當狡猾和精於世故。舉個例子，無數西方人被上師們近乎煩人的謙卑的表演所迷倒，而很少人知道，在這些謙卑的面紗背後，隱藏著爭坐最高法座的激烈鬥爭。這種鬥爭已經嚴重到了這個地步：某些上師已樂意跟他們自己的老師平起平坐，或者坐在比老師更高的法座上。當與會的人數

眾多時，特別是如果有來自台灣的信眾（他們似乎很看重上師的階位，或者看重上師的名字前有多少個“H”，全憑這些來判斷一位上師的價值），這種勾心斗角的競爭變得格外劇烈。

佛陀在摩揭陀的街上托著乞鉢赤足而行的謙卑形象，業已成為了一個單純的神話。

上師們在西藏的影響力和主宰權，不僅“削弱”了西藏人的世俗生活，比如藝術，音樂和文學這些上師們並不感興趣的東西，同時還在一定情況下使佛法墮落了。要不是因為佛陀的無神論的根本見地，這些心胸狹隘的上師們的統治手段，有可能跟塔利班一樣殘暴專斷。

儘管西藏上師們強調應促進各教派合作的態度，許多人卻仍鼓勵宗派主義，霸佔性的看管著他們的藏人弟子們，反對他們學習其它教派傳承的法教。當然嘍，他們總有一個老生常談的理由：如果從學於其它教派，他們的弟子們會被弄糊塗的。由於這個原因，許多藏人弟子對其它教派傳承完全一無所知，但這似乎並不妨礙他們詆毀其它教派。僅僅這樣對待藏人弟子，上師們似乎還覺得有欠滿足；他們還訓練他們的西方弟子們參與這個宗派主義的遊戲，並且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他們同時也滿

懷戒心，疑忌的看管著他們在西方的佛法中心，儘管很多佛法中心僅僅被用來為這些上師和他們的駐錫寺院提供經濟上的支持。真要說支持真誠追求佛法的西方弟子，或輔助他們的修學，這些目標並不是這些上師的主要興趣所在。

如此說來，藏傳佛教是否真在“蒙昧蠻荒”的西方“可行”呢？答案無疑是確定的。佛教傳入蒙昧蠻荒的西藏，並且繁榮昌盛，就是一個明証：即使存在由於個性差異和異國文化所致的種種過失，佛教在各個國家，在不同性別和文化背景下，都有能力做到，也仍然是切實可行的。如果像那位作者一樣，僅僅由於少數藏人行為失當，或者由於他們看似“復雜難懂及豐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就把整個佛法給摒棄了，這並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記住這一點很重要：西藏人花了很多年，通過好幾代人的極富勇氣和虔信的努力，才將佛法穩固的建立在西藏社會中。那麼，我們憑什麼期待在西方社會建立佛法就會迥然不同呢？

此外，從唯物主義者的角度度量佛法的價值，或者基於所謂的客觀觀點而傲慢自大的論斷佛法，都是很危險的。諸如飛機能飛和輪船不會沉此類的客觀現象，確實能很明顯的被觀察



到；但誰能斷言一個人是否已臻証悟之境呢？與此類似，當我們比較不同的社會體系時，也應該小心謹慎才是。那位作者評論說，“美國的社會治理體系遙遙領先於藏王赤鬆德贊的社會體系”，這實在是判斷失誤。在美國治下，成千上萬的美洲土著人被屠殺，更別提“社會治理”了。相形之下，藏王赤鬆德贊極具遠見的看到了佛教的社會價值。他將佛教從印度這樣一個跟西藏罕有共同之處的國家引入到了西藏，並克服了無數的挑戰，例如來自熱衷獻祭的苯教的敵視。如果不是他的創舉，西藏人也許會接受當地部落的殘忍嗜殺的生活方式，或者接受來自鄰國中國的所謂文明——曲意奉承的儒家思想。

更進一步地說，那位作者斷言西方社會“深刻的理解了作為菩薩意味著什麼”，並將之與“人道主義”或者“社會運動主義”做比較，他全然誤解

了佛教的要義。菩薩的誓願，超越了對“貧困的”或“無助的”眾生的單純的同情心。那種僅出自同情心的慈悲，將不可避免的讓人變得依賴外緣，產生不安全感，並最終導致自我中心，因為最終人總是以他提供了多少幫助來定義自身的價值。與此相反，菩薩們並不執著於他們助人的行動或者結果；他們的目標，是將眾生從輪回的陷阱和自由的迷思中解救出來。

於是有人會好奇：那麼菩薩們應該體現出什麼樣的行為舉止呢？溫和？寧靜？謙卑？苦行？責備上師們追求物質的不當行為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信不信由你，成為他們看似有實益的純朴個性的犧牲品是一件更容易的事情！這種虛偽是最常見的假面具。我可以很輕易的看到，我自己就是讓那位作者對西藏上師美好的幻想破滅的那類上師，因此在許多場合，我常常無法抑制的感覺到自己的全然虛偽。儘管我寫了這篇文章，如果有人供養給我，不管是高法座，還是名牌鞋子，甚至是四十九輛勞斯萊斯汽車，我知道我還是不會放棄這樣的特殊待遇的。

上師們雖理應斷離貪欲，但卻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享受著所有能想象到的特權；這看起來似乎冒瀆而且墮落。與之類似，當一個理應慈悲善巧的上師表現得專斷而

心胸狹隘時，看上去也是不對的。但我們必須意識到，單純生活的表象也是很有欺騙性的。聽起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正如某些人發現他很難放棄世俗的東西一樣，另外一些人則極為擔心他們將會失去苦心營造出來的單純、出離和毫不在乎的狂智的個人形象。若一個人隻為了保持謙卑和純朴的形象而放棄世俗的享樂，難道不是痛苦且徒勞無功嗎？這樣的人不僅在靈性的道路上所行不遠，而且在整個過程中，他錯過了許多世俗的樂趣。這樣看來，如果他們在利益眾生的事情上表現得私心很少或者並無私心的話，我們就不應該譴責那些表面上看似追求世俗享樂的少數上師或者修行者。

我們應該尊崇並效法他們這種絲毫不為旁人的意見所動的態度：例如別人讚美他們的純朴，或者抨擊他們追求世俗享樂的丑聞，他們都全不在乎。我們還應尊崇並效法他們這種態度：不論是因謙卑的表現而贏得弟子，或是因過失而失去弟子，他們也都毫不在乎。至少我們應仰慕他們這種不虛偽矯飾的態度。而我跟他們不一樣；要說克服這種假謙卑的虛偽矯飾以及達到發自內心的毫不在乎，我感覺我自己還差著十萬八千裡。對我來說，出離心，謙卑，以及脫離世俗，仍然是我修行道路上的主導原則。但這可不是因為我看透了世俗生活的徒勞無益；這隻是礙於我是 “ 藏

傳佛教上師” ， 通常普羅大眾都認為一位上師應該具有例如謙卑這樣的美好品質；而我又很在乎別人怎麼看我。尚然如此，無論我們怎麼論斷，都總是徒勞的。這並不表示論斷別人在道德上或者政治上就是不正確的；而隻是說，主觀性是一切論斷的真正核心。

— 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